

又有85个县脱贫摘帽

未来脱贫攻坚战的硬骨头是什么

脱贫攻坚战以来脱贫摘帽县总数达153个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国务院扶贫办17日宣布,陕西延长县等85个贫困县(市、区)达到脱贫标准,摘掉了贫困帽。这是我国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第四批宣布脱贫摘帽的贫困县,也是数量最多的一批。至此,我国中西部20个省区市2017年申请退出的125个贫困县,全部摘掉了贫困帽。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记者于文静 董峻)国务院扶贫办17日宣布,陕西延长县等85个贫困县(市、区)已达到脱贫标准,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同意,由相关省区人民政府宣布脱贫摘帽。这是我国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第四批宣布脱贫摘帽的贫困县,也是数量最多的一批,至此,四批脱贫摘帽县总数达到153个。

此次脱贫摘帽的85个县是:
河北省(11个):平山县、青龙满族自治县、魏县、平乡县、威县、易县、平泉市、盐山县、武邑县、饶阳县、阜城县。

贵州省(14个):桐梓县、凤冈县、湄潭县、习水县、西秀区、平坝区、黔西县、碧江区、万山区、江口县、玉屏侗族自治县、兴仁县、瓮安县、龙里县。

云南省(15个):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罗平县、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云县、牟定

县、姚安县、石屏县、勐海县、祥云县、宾川县、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洱源县、鹤庆县、芒市。

西藏自治区(25个):林周县、当雄县、尼木县、曲水县、堆龙德庆区、达孜区、墨竹工卡县、类乌齐县、丁青县、桑日县、琼结县、曲松县、洛扎县、加查县、错那县、白朗县、康马县、定结县、吉隆县、聂拉木县、比如县、噶尔县、工布江达县、米林县、波密县。

陕西省(4个):延长县、佛坪县、横山区、定边县。

甘肃省(6个):皋兰县、崆峒区、正宁县、两当县、临夏市、合作市。

青海省(7个):平安区、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刚察县、格尔木市、德令哈市、乌兰县、天峻县。

宁夏回族自治区(1个):盐池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个):尼勒克县、吉木乃县。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和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部署安排,2018年7月至8月,国务院扶贫办将9个省区的85个县列为2017年第二批申请退出县,并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专项评估检查。结果显示,11个中部地区贫困县综合贫困发生率全部低于2%,74个西部地区贫困县全部低于3%,均符合脱贫摘帽条件。至此,中西部20个省区市2017年申请退出的125个贫困县全部摘掉了贫困帽。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夏更生表示,这85个县脱贫摘帽符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退出质量经得起检验,退出结果社会认可、老百姓认账,是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决胜期的重要成果。他同时表示,这只是脱贫攻坚的阶段性胜利,脱贫摘帽后要坚持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持续用力,继续攻坚。

评估:尊重实际,组织第三方机构专项检查

2017年,中西部20个省份原计划161个贫困县脱贫摘帽,今年4月正式申请脱贫摘帽的贫困县减少到125个。6月至8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对125个贫困县退出情况分两批开展专项评估检查。

结果显示,36个中部地区贫困县综合贫困发生率全部低于2%,89个西部地区贫困县全部低于3%,均达到脱贫摘帽条件。经扶贫领导小组同意,第一批11个省区市的40个县于8月初由相关省区市宣布脱贫摘帽,第二批9个省区的85个县也于9月底前相继宣布摘帽。

“这125个县能够脱贫摘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科学指引的结果,也是各级党委政府履职尽责、社会各界真帮实扶、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艰苦奋斗的结果。”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夏更生说。

特点: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步伐加快,错退率漏评率显著下降

从区域分布看,实现贫困县脱贫摘帽的省份由2016年的9个,增加到2017年的20个。西部12个省份都有贫困县退出。

从摘帽数量看,2017年共125个贫困县脱贫摘帽,是2016年的4.5倍,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步伐明显加快。

从退出质量看,县域整体面貌发生明显变化。贫困村水、电、路、网等突出短板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主要指标接近或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处于本省上游。脱贫人口错退率和贫困人口漏评率均较2016年显著下降。

从群众认可度看,无论是进村入户调查,还是访谈县乡村干部、县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脱贫摘帽都给予高度认可。群众认可度全部超过90%。同时,这125个县贫困规模较小,贫困程度不深,基础条件相对较好,也是脱贫摘帽的重要因素。

计划:年底全国将有半数贫困县摘帽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从2018年起,贫困县退出专项评估检查由各省统一组织,并对退出贫困县的质量负责。这是贫困退出机制的重大变革。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将有一半的贫困县实现脱贫摘帽,这是脱贫攻坚的重大成果。”夏更生说,根据各省减贫滚动规划,2018年计划退出约270个县,2019年计划退出330个左右,2020年计划退出70个左右。

“这只是计划,具体工作中必须进度服从质量。”夏更生强调,按照目前的计划和节奏,只要坚持现行扶贫标准、压实责任、加大力度、精准施策,到2020年能够如期完成贫困县脱贫摘帽任务。

国务院扶贫办将指导各地结合实际,调整脱贫规划和年度计划,总结两年评估检查经验,压实省级考核评估责任,同时对各省评估检查的贫困县按照20%比例进行抽查评估,确保贫困县脱贫摘帽标准不降低,要求不放松,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

聚焦:深度贫困地区,贫困老年人、重病人、残疾人

贫困县脱贫摘帽只是阶段性胜利,仅初步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这些县大多还有未脱贫人口;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因病因残致贫比例分别超过40%、14%;“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有的地方生产生活条件甚至还是“一步跨千年”。

2017年9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根据意见要求,中西部22个省份和辽宁、山东等24个省区市确定深度贫困县334个、深度贫困乡镇1800多个、深度贫困村3万个,并制定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专项方案。

一年来,各部门积极作为,25个部门共出台了26个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政策文件。2018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安排新增资金120亿元支持“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占增量资金的60%。

下一步,国家将聚焦“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聚焦贫困老年人、重病人、残疾人,加强夯实基层党组织,增强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动员全社会合力攻坚,强化考核评估,倒逼深度贫困地区工作落实。

三过草地心犹壮,一死高台志未移——杨克明



这是杨克明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新华社重庆10月17日电(记者陈国洲)“三过草地心犹壮,一死高台志未移。”这副镌刻在杨克明烈士墓碑上的挽联,是烈士生平事迹的写照。英烈虽逝,浩气长存!他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激励着无数后来者为国家强盛,民族复兴接力前行。

杨克明,原名陶树臣,为开展革命工作化名洪涛、洪涛尔、杨克明。1905年出生于四川省涪陵县(今属重庆市长寿区),1925年参加社会主义青

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杨克明受中共四川省委军委派遣,在涪陵、丰都、石柱等县组织农民暴动,开展武装斗争。1930年4月,参加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的组建工作,先后担任游击队副队长、中队长。1932年夏,任中共梁山(山)达(县)中心县委书记,与川东游击军总指挥王维舟紧密配合,发动党组织和群众全力支援川东游击军的斗争,扩大革命武装,坚持并发展了川东游击根据地。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杨克明、王维舟领导川东游击军配合红四方面军斗争,1933年11月,川东游击军正式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杨克明任军政治委员。他深入宣汉、达县等地,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同时为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提高部队战斗力,粉碎敌人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六路围攻,做了大量艰苦工作。

1934年后,杨克明任红四方面军补充师政治委员、独立师师长,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1936年1月,红三十三军与红五军团合编组成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杨克明任军政治部主任。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红五军等部队于1936年

10月下旬奉命西渡黄河。杨克明与董振堂等率领部队转战河西走廊,与国民党西北军阀进行了英勇艰苦的斗争。

1937年1月20日,在高台战斗中,红五军主力与超过自己六七倍的敌人顽强作战,敌人以优势兵力轮番猛攻高台城。在弹药无援、兵员无补的情况下,杨克明与董振堂等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率领部队浴血奋战,坚守高台,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时年31岁。

董振堂、杨克明等血战高台牺牲的噩耗传到延安,党中央和广大红军将士无不为之悲痛万分。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及延安民众在宝塔山下召开追悼大会,沉痛悼念董振堂、杨克明等血战高台的红军战士。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甘肃省高台县为血战高台壮烈牺牲的红军指战员修建了高台革命烈士陵园和红军烈士纪念馆。

如今,杨克明故乡重庆长寿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从过去传统的农业县逐渐转变为工业强区。同时,长寿区政府积极筹备修缮杨克明故居,传承发扬烈士英勇无私的革命精神。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誓

跨省倾倒固废污染长江

12人被判刑并要求公开道歉

新华社合肥10月17日电(记者张紫赞)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日前对被告人李闯等12人污染环境案及检察机关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依法公开宣判。一审以污染环境罪判处各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六年不等,并处罚金一万元至二十万元不等;对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法院同时对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3月、2017年1月,被告人董梅生和被告人李闯先后注册成立无处置固体废物质的环保服务公司。后李闯通过伪造公司印章等方式,谎称有合法处置资

质的企业为最终接收处置单位,与苏州市、嘉兴市相关企业洽谈承接工业污泥处置业务。但李闯实际并未将工业污泥处置到合同约定的企业,而是通过层层转包的方式,与其他被告人分工合作,共同实施工业污泥的跨省非法转移和处置。

2017年10月中下旬,李闯、董梅生从江苏、浙江的9家企业收集工业污泥共计2500余吨,经转手后由被告人黄安刚等人跨省运输至安徽省铜陵市江滨村长江水域。黄安刚等人伙同他人于2017年11月上中旬将该批工业污泥直接倾倒在江滩边,造成环境严重污染。

法院还查明本案部分被告人伙同他人非法倾倒废胶木污染环境以及非法倾倒有害工业污泥未遂的事实。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闯等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污染环境罪,且属共同犯罪。法院在综合考虑各被告人量刑情节后,依法作出前述判决。

此外,法院判决各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和9家附带民事诉讼被告单位连带赔偿因非法倾倒污泥产生的应急处置费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和鉴定评估费用合计1302万余元,同时就污染环境行为在安徽省省级新闻媒体上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赔礼道歉的内容及媒体、版面、字体须经法院审核。